臺大歷史學報第 59 期
2017 年 6 月，頁 171-215

BIBLID1012-8514(2017)59pp.171-215
2015.12.16 收稿，2016.12.22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4

星火何以燎原
——朱毛紅軍的崛起之路

任　偉*

提　要

中共軍隊從朱毛紅軍算起，最初只有幾千人，但短短三、四年時間便發展到數萬人之眾，這其間的因緣際會值得探討。初上井岡山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王佐等人各懷心思；紅軍也遲遲難以壯大，卻在 1929 年初被迫逃亡到贛南閩西後，迅速打開局面。但這一發展歷程實際上並不在毛澤東的計畫之內，中共可以說是因禍得福。1930 年後，紅軍規模急劇膨脹，除地緣因素外，也與中央的激進政策有關。李立三主政時期，中共中央倡導向中心城市進攻，雖然毛澤東極力反對，但這一「歷史的誤會」，竟然再次陰差陽錯的促使紅軍部隊獲得大發展。到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紅軍已經呈現盛極而衰的跡象，但戰爭還在繼續，中共很難停止「擴紅」。那麼，中共在蘇區的徵兵規模到底如何？百姓又作何反應？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

關鍵詞：紅軍　擴紅　毛澤東　蘇區

*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講師
100091 北京市海淀區大有庄 100 號；E-mail: renweirenjing@163.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明滅飄忽的「星火」
二、因禍得福：紅軍急劇擴張之緣由
三、增長的極限：紅軍後期的發展情勢及其困境
結語：捲土重來未可知

前 言

國共合作破裂後，中共不斷發起武裝暴動，但多數歸於失敗。後來毛澤東（1893-1976）、朱德（1886-1976）各率殘部千餘人在井岡山會合，短短三、四年內，這支不起眼的小部隊竟迅速膨脹，發展到數萬人之眾。對此，毛澤東有個很形象的說法，即「星火燎原」。這是很詩意的講法，省略許多曲折的情節。中共所謂的革命，是鐵與血的較量，多數情況下，點點「星火」其實很容易被撲滅。放置在近代軍閥割據的背景中看，紅軍能在日後將半個中國攪動地天翻地覆，令人意外。同時期與他們規模相當的軍事武裝數不勝數，朱毛紅軍何以能夠與眾不同？又何以能夠「星火燎原」？

現存關於中共軍事的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注重軍事體系沿革，運用資料較為豐富；但這類著作往往只限於平面描述，對軍事變化的內因外緣缺乏分析與解釋。[1]二、以軍事領導人為中心，側重於突出領導者的個人魅力；此種論著由點到面，較為生動詳細，但文本敘述過於凸顯歷史的必然性，對於出乎領導者意料之外的因素重視不足。[2]革命武力之壯

1 張廷貴、袁偉，《中國工農紅軍史略》（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劉秉容，《中國工農紅軍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李建國，《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黎連榮，〈「朱毛紅軍」的發展沿革及戰鬥歷程〉，《軍事歷史》2002 年第 4 期（北京），頁 62-67。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金冲及主編，《毛

臺灣大學博物館藏資料庫

大，固然有外在的結構性因素，其間的偶然性亦值得注意。例如，井岡山時期，朱毛紅軍並未大幅發展，轉移到贛南閩西之後才突飛猛進。雖然毛澤東曾極力論證井岡山根據地的優勢，但當地經濟貧瘠，且強敵環繞，紅軍發展機會並不大。1929 年初，朱毛紅軍被迫撤離井岡山，後來獲意外發展，恐怕是毛澤東此前未曾預料到的。應該說，紅軍之壯大並不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從井岡山下來之後，紅軍一路狼狽奔走，損失慘重，中共中央已對其喪失信心。1929 年 2 月曾建議朱、毛將軍隊化作小股，潛入鄉村，並令二人「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3]毛澤東堅決不從。紅軍後來輾轉到閩贛交界一帶，國民黨在這一帶的力量極為薄弱，朱毛因此獲得喘息之機。檢視史料不難發現，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之後，經常是誤打誤撞，完全沒有戰略性規劃。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之開闢，與其說是得益於革命黨人的高瞻遠矚，不如說是因為國民黨軍隊壓迫的結果。若是國軍一直將朱毛圍困在井岡山，即便不能將其消滅殆盡，僅憑井岡山的物力與人力，毛澤東也不可能使紅軍有突破性發展。可見中共軍隊之壯大是多重合力的結果，其間的曲折與偶然值得細細梳理，不可籠統概之。

其次，除去某些運氣成分，中共自身的努力與調適亦值得探討。從井岡山時代、李立三（1899-1967）主政時期，再到反「圍剿」時期，中共中央關於軍事的發展策略不斷變化，其間有得有失，並不是一帆風順。本文將詳細揭示這些變動的內因外緣，希望能夠穿透表面現象，從深層理解中共革命壯大的成因。

1927 年底，毛澤東所部上井岡山時只有幾百人；1928 年 5 月，朱德上山後，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成立，「全軍萬餘人」。[4]半年多後，即 1929 年初，因抵抗不住國民黨「圍剿」，朱毛紅軍向贛南閩西轉移時只剩下

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3 〈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關於目前國際國內形勢和黨的軍事策略〉（1929 年 2 月 7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第 5 冊（一九二九），頁 37。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上卷，頁 239。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3,000 餘人。又過一年多，即 1930 年 8 月，紅一方面軍成立，朱毛紅軍達到空前的 30,000 餘人。中共軍隊規模變化幅度之大，令人震驚。中共軍隊規模不穩，還表現在回憶錄及史料資料統計上，同一時間、同一軍隊的數量，往往存在頗大差別。因為沒有最原初的材料作比對，很難判斷哪一種資料最準確。但資料混亂，或也恰恰說明，中共軍隊在發跡之初，處於狂飆式的劇幅變動狀態，且持續到第四次反「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後，紅軍規模達到極限，遇到難以突破的瓶頸。但戰爭還在繼續，需要大量兵源，故徵兵工作不能停息，強迫從軍現象普遍發生，現存研究已有觸及。[5]本文不欲重複描述中共強迫擴紅（按：擴紅指「動員農民從軍」）的政策與舉動，擬從兩個特殊群體入手——黨員和婦女，通過研究他們對擴紅的反應，考察紅軍部隊面臨的境況。黨員是革命的中堅力量，理應衝在最前線，如果連這個群體都畏縮不前，那麼中共革命的困境顯然不是動員所能解決。此外，婦女與戰爭的關係，表面上較為疏遠，但事實上，戰爭將危害她們的丈夫、兄弟或兒子，對其產生深遠影響。這兩個群體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共革命所遇困境的折射。本文將詳細描述黨員與婦女在擴紅中的表現，以期通過「以小見大」的方式，剖析中共革命在後蘇區時代的挫敗緣由。

一、明滅飄忽的「星火」

中共軍隊發源於井岡山，最初的部隊由四部分構成。其一，王佐（1898-1930）、袁文才（1898-1930）部。中共力量到來之前，他們就盤踞在井岡山打家劫舍，是純粹的地方性武裝。其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三灣改編」後拉上井岡山，人數不足 1,000 人，是第一批外來武裝。其三，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6]殘部及湘南農軍，有 4、

5 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 328-339。

6「起義」一詞是中共革命勝利後文獻中的常用語，帶有強烈的道德批判，本文擇取引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000 人，1928 年 4 月到達井岡山。其四，彭德懷（1898-1974）領導的平江「起義」部隊，約 800 人，1928 年 12 月到達井岡山。這四部分人底色各異，不易融合。

首先談秋收起義部隊。最初，部隊約有 5,000 人，1927 年 9 月 9 日起事後，因連續遭遇重挫，9 月 29 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已不足 1,000 人。部隊當時人心渙散，槍彈、糧食等物資嚴重不足，傷兵也無法安置。為挽救危局，毛澤東對部隊進行改編，將三個團縮編為一個團，並遣散一些不願留下的士兵，即著名的「三灣改編」。稍後，毛澤東派人與王佐、袁文才取得聯繫，為求得他們的援助，毛慷慨贈送槍枝百餘條。袁、王投桃報李，資助起義部隊 500 擔稻穀和一些銀元，並幫助安置傷患。[7] 至此，起義部隊才算初步站穩腳跟。

毛澤東上井岡山後，即面臨與袁、王如何相處的問題。早在上山前，起義部隊就曾討論過這點。當時有人提議直接武裝吞併或「鳩占鵲巢」，將袁、王部趕出井岡山。毛澤東不同意「大魚吃小魚」，認為「只能用文，不能動武」，要爭取和平改造。[8]暫且不論道德層面的考慮，僅從各自力量的對比上看，「和平改造」亦優於「大吃小」。當時，秋收起義部隊不足 1,000 人，僅 500 多支槍，且因多次挫敗，士氣低落，戰鬥力極為有限。而袁、王當時有 4、500 人，2、300 支槍，力量稍弱於起義部隊，但他們是「地頭蛇」，熟悉井岡山的風土人情，雙方硬拼起來，起義部隊未必能占到便宜，「和平共處」是較為實際的方案。

但問題是，即便毛澤東想和平共處，袁文才、王佐等人也未必願意。他們的地盤意識很強，十分拒斥毛澤東。10 月初，毛澤東派人送信給袁文才，表示願意合作，共同建立革命根據地，袁文才對此十分猶疑。他的文書陳慕平（1902-1930）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聽過毛澤東的課，介紹說

僅是遵循慣例；部分「暴動」之用語是遵照當時歷史文獻。這兩個詞彙所指歷史內容基本一致。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223。

8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 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毛澤東有見地、有思想，影響力非凡，與彭湃（1896-1929）並稱為共產黨人中的兩大「農運王」。雖然陳慕平極力鼓吹，但袁文才對毛澤東還是存有戒心，最後寫了一封措辭婉轉的回絕信，推托「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9]毛接信後，不動聲色，帶少數隨從到大倉村會見袁文才。袁起初還很疑懼，預先埋伏 20 多人，見毛澤東只帶幾個人來，才稍稍放心。[10]兩人深入交談後，毛澤東慷慨贈送 100 支槍給袁文才，此舉應頗出乎袁氏意料。100 支槍不是少數，幾乎頂得上袁文才部的全部武器裝備。當時秋收起義部總共也只有 500 多支槍，毛澤東為籠絡袁文才，可謂下足本錢。當時有一些人不同意送槍給土匪，起義領導人黃埔生余洒度（1898-1934）即是其一，他後來甚至以此事向中央狀告毛澤東。但若無毛澤東的大手筆，袁文才很可能不會接納起義部隊。100 支槍看似貴重，換來一個戰略休憩地，實際上相當合算。而余洒度等人反對與土匪聯合，可能是因為眼界、氣度不夠開闊，也與中央的政策有關。當時中央明確規定，對待土匪要聯合部眾，孤立領袖。[11]毛澤東的做法明顯違背中央政策，余氏等反對者的意見並沒有錯，只是難以實踐。

袁文才得到槍枝後，隨即回贈 600 塊銀元，並同意起義部隊在茅坪（一個有 60 多戶人的村子）建立後方醫院和留守處，同時還答應去做王佐的工作。[12]袁氏雖然示好，但並未完全放心，他對毛澤東說：

> 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患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打土豪。[13]

9 曾憲文、劉曉農編，《井岡山鬥爭軼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頁 39。

10 黃惠運，〈毛澤東、袁文才大倉村會見〉，收入胡龍生、劉文源主編，《崢嶸的井岡歲月》（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頁 31。

11 〈中共中央關於兩湖暴動計畫決議案〉（1927 年 9 月 12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 35。

12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183。

13 蘇蘭春，〈回顧寧岡的革命鬥爭〉，收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很明顯，這是要求起義部隊到他的地盤之外活動。井岡山上的兩支部隊，在初步試探之後，雖然相互表示友好，但仍深具戒備警惕之心。

1927 年 10 月中旬，毛澤東遵照袁文才的意見，率主力部隊到酃縣、茶陵打游擊，只留下傷病員。然而游擊並不順利，10 月 23 日清晨，毛部在遂川縣大汾鎮突遭地主武裝襲擊，毛澤東率團部與特務連撤退，主力被打散，最初只找到失散人員 40 多人，情形十分狼狽。當時擔任連指導員的羅榮桓（1902-1963）回憶說：

> 大家又饑又餓，無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幾個戰士帶著錢從老百姓家裡找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一起用手抓飯吃。[14]

部隊出師不利，只得返回井岡山。據陳士榘（1909-1995）回憶，當時心情十分複雜，一方面部隊遭重創，人數銳減，不知上山能否有保障；另一方面，隊伍無路可走，只有上井岡山才能得到休整。[15]

10 月 24 日，毛澤東率起義部隊行至井岡山西南荊竹山下，幸得王佐派人接應上山，27 日到達王佐的大本營茨坪。或許因為此前袁文才做過疏通工作，王佐對毛澤東比較歡迎。毛部當時物資極為匱乏，為緩燃眉之急，毛澤東故技重施，贈送王佐 70 支槍，再次換取一些稻穀和銀元。雖然雙方禮尚往來，但兩支部隊畢竟生疏，共處日久，很容易引發矛盾衝突。11 月初，稍經休整後，毛澤東即率主力部隊回到寧岡縣茅坪鎮，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

為避免摩擦，毛澤東部與袁、王部一起活動的時間並不多。毛部多數時間在山下攻城掠地，積極向外擴張，此乃源於「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理念，也有迫於現實的壓力。秋收起義部隊初來乍到，沒有物質基礎，必須向外擴張才能解決食糧問題。例如，起義部隊先後攻打茶陵、遂川、寧岡等縣城，都與解決軍需有關。而袁、王部隊在井岡山盤踞多

頁 91。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223。

15 陳士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頁 1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物質基礎較為豐厚，多數時候駐守山上，很少主動參與進攻。毛澤東在前方打勝仗時，袁、王在後方也能分一杯羹，自然樂觀其成。概言之，在利益分配上，這兩支部隊沒有出現根本衝突，才能進行良好互動。

兩支部隊相安無事，想法卻很不一樣。袁、王有意與革命軍保持距離，試圖「平等合作」，各自為安；但中共所追求的並不是「各走各路」，而是要「改造」袁、王所部，以為我所用。1927 年 10 月毛澤東與袁文才初步接觸後，即派游雪程（1903-1930）、徐彥剛（1907-1935）、陳伯鈞（1910-1974）協助進行政治、軍事訓練。此後，毛澤東又多次與王佐交談，試圖說服他加入革命。1928 年 1 月，王佐最終同意何長工（1900-1987）到他的隊伍中擔任黨代表。此間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在力量均等或稍弱的情況下，中共從未擔憂被「改造」或被「吞併」，他們思考的問題通常都是要如何「改造」他人，反映出中共黨人極強的自信。

所謂「改造」，其實是中共一廂情願，雙方若勢均力敵，「友軍」並不會輕易接受被改造的命運。袁、王二人並非木偶，他們對中共力量的滲透非常警惕。據何長工回憶，王佐很怕中共「拆他的臺」。何氏初到時，王佐稱司令部居住不方便，將其安置在離部隊一公里遠的一處小屋裡，並派了一個頗不簡單的「勤務兵」照看，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王佐還對何長工講：「你初來山上，人生地不熟，千萬不要隨便走動，以免發生意外。」此舉其實是警告何：不許私下活動，不准與士兵接近。[16]

面對如此戒備，何長工從王佐的母親和其心腹部下刁文林、李克昌入手，首先取得他們的信任，再通過他們的遊說，逐步消除王佐戒心。此後，何長工又用伏擊戰術幫助王佐消滅死敵——地方士紳尹道一，從而進一步贏得信任。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眼看條件成熟，何長工遵照毛澤東指示，邀請袁、王加入紅軍。1928 年 2 月上旬，袁、王部隊正式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為團長，王佐為副團長，何長工任黨代表。

16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頁 123-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

總體而言，毛澤東對袁、王部隊的爭取，可謂較為成功。追其緣由，除何長工等政工人員的努力外，毛澤東個人態度也十分關鍵。當時，中共中央對待土匪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利用」二字，通常把他們看作異己力量。但毛澤東與眾不同，他在「八七」會議[17]提及土匪問題時，明確表示：不能只利用他們，「利用」是孫中山的老辦法，「我們不應如此」；「只要我們實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領導他們的。我們應當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弟兄，不應看作客人」。[18]也許正是因為毛澤東拿土匪當「自己的弟兄」，袁文才、王佐才特別服帖。後來彭德懷、龍超清（1905-1931）等人與袁、王發生嚴重衝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始終視袁、王為異己，防範心很重，與毛澤東的態度大相逕庭。

毛籠絡住袁、王部之後，井岡山很快又迎來葉挺（1896-1946）、周恩來（1898-1976）、賀龍（1896-1969）領導的南昌暴動部隊。南昌暴動部隊原有 20,000 餘人，1927 年 8 月底在會昌與錢大鈞（1893-1982）部激戰，傷亡千餘人；9 月底潮汕再次戰敗，部隊幾近崩潰，只剩 2,500 人左右。其中一部由董朗（1894-1932）、顏昌頤（1898-1929）率領進入海陸豐地區（今廣東汕尾）；另一部由朱德、陳毅（1901-1972）率領轉戰湘南。轉移途中，指揮官紛紛脫隊，到 10 月下旬，師團級政工幹部只剩陳毅一人，[19]士兵情形更為散亂。據時任連長的楊至誠（1903-1967）回憶，因為情勢艱苦，士兵難以指揮，「名義上我是連長，可是我所在的連隊的人員數目在這段時間裡就沒有弄清過，也沒有齊全過。一個人，一個班，甚至成排地自由行動起來」。[20]據不完全統計，該部轉戰江西途中，300 多名軍官和士兵脫逃，最後只剩下 7、800 人，參謀長還是第一個跑掉的。十多年後，朱德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7 指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於漢口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

18 〈毛澤東關於農民鬥爭決議案的發言〉，收入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八七會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 73。

19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上卷，頁 98。

20 楊至誠，〈艱苦的轉戰〉，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頁 31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1892-1950）談及此事時，仍「滿懷憤恨」。[21]

從個人的發展機遇來看，或許朱德、陳毅不應那麼「憤恨」，正是因為很多人走了，他們才能脫穎而出。事實上，南昌暴動時，朱德並不是重要角色，周恩來、劉伯承（1892-1986）、賀龍、葉挺等人才是領導核心。陳毅後來回憶，「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算重要，也沒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22]聶榮臻（1899-1992）也表示，南昌暴動時，朱德實際上沒有什麼兵權，只是帶領葉挺部的一個連打先鋒。潮汕戰敗後，他才指揮第二十五師在三河壩作戰。[23]其後，葉挺去香港，周恩來、賀龍等人輾轉到上海，第二十五師師長周士第（1900-1979）、黨代表李碩勳（1903-1931）也都早早離開後，朱德才有機會在群龍無首的混亂中發揮作用。

1927 年 10 月底，暴動部隊抵達江西大庾，朱德在此整編部隊，最終取得領導權。但大庾整編之後，暴動部隊仍然無處安身，朱德一度投靠滇系國民黨將領范石生（1887-1939）。捱過最艱難的幾個月後，1928 年初，朱德率部脫離范石生，並隨即發起湘南暴動。暴動過程中，革命隊伍急劇增加。例如，1928 年 2 月 1 日，朱德將宜章獨立團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三師，胡少海（1898-1930）任師長，留守宜章（共 7、800 人）。2 月 5 日，將郴州農民自衛軍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七師，鄧允庭（1879-1931）任師長，黨代表夏明震（1907-1928）。[24] 2 月 19 日，攻克耒陽，將耒陽分散的小游擊隊組織起來，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師，鄺鄘（1897-1928）任師長；此外，朱德還協助永興農民武裝攻克永興縣城，組建永興紅色

21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著，梅念譯，《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頁 251。

22 陳毅，〈關於八一南昌起義〉，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頁 119。

23 聶榮臻，〈從現在去認識過去，從過去來瞭解現在〉（1942 年 8 月 1 日），收入氏著，《聶榮臻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 187。

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上卷，頁 104、10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警衛團（約 800 人），尹子韶（1896-1935）任團長，黃克誠（1902-1986）任黨代表。[25]

湘南暴動短短幾個月，部隊人數急劇增加，但也同時面臨兩個極難解決的問題，導致暴動部隊在湘南無法立足：第一，暴動燒殺太重，遭致地主、士紳的強烈反彈與報復；第二，軍需糧草短缺。1928 年 4 月，朱德被迫率主力部隊及各縣農民武裝往井岡山轉移。5 月 4 日，朱、毛兩部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共 6 個團。其中第二十八團是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第二十九團是宜章的農民武裝；第三十團、三十三團是耒陽、永新、資興等湘南各縣的農民武裝；第三十一團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第三十二團是王佐、袁文才舊部。每團約有 1,500 人，全軍近萬人，但只有 2,000 多支槍。

朱德上山後，井岡山部隊總人數增加一倍有餘，軍需食糧問題很快凸顯。井岡山地理位置偏僻，土地貧瘠，物產匱乏，難以養活如此眾多兵員。1928 年 5 月，紅四軍軍委決議將各縣武裝送回湘南。[26]於是，由湘南農民武裝組成的第三十團、第三十三團被送回家鄉。這兩個團被拆編為 4 個游擊縱隊，預備回鄉打游擊，但一到湘南即被打垮，迅速瓦解。黃克誠後來反省：當暴動隊伍拉上井岡山之後，因山上生活給養不濟、環境困難，上級作出讓各縣武裝返回湘南打游擊的決定，過於匆忙，欠缺周密考慮，實非上策。[27]黃克誠對此決策頗有微辭，但也沒有提出更好辦法。井岡山時期，中共軍隊發展的首要瓶頸為糧食問題。在一個狹小且貧瘠的區域內，不論紅軍如何騰挪轉移，食物獲取都極為困難，部隊只有通過減員來保存精銳力量。

送走第三十團、第三十三團之後，另一農軍武裝第二十九團也要回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上卷，頁 107。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郴縣縣委代表侯成瑞給中央的報告——關於 1928 年湘南暴動前後各方面情況和郴縣工作的恢復〉（1930 年 6 月 16 日作於上海），收入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印，《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縣委、蘇維埃、群眾團體）1927 年-1933 年》（內部出版，1984），頁 180。

27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頁 75。

臺灣大學政治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鄉，原因有二：其一，農民離家後思鄉心切，加之即將秋收，很多士兵都嚷著要回家割稻子。歐陽毅（1910-2005）後來評論道，「農軍回鄉情緒太普遍，太可怕，不贊成回鄉的遭到孤立」；[28]其二，湖南省委、湘南特委都希望朱、毛去湘南發展。杜修經（1907-2007）回憶，當時湖南省委與江西省委沒有什麼聯繫，站在湖南省委的立場，當然要紅軍去湘南。[29]這說明當時各省委調動軍隊，並不是從革命全域出發，而是優先考慮本省利益。湖南省委派杜修經動員朱毛，毛澤東執意不就。杜修經無法命令毛澤東，便趁機鼓動第二十九團士兵，迎合他們回家的願望，將部隊拖往湘南，同去的還有朱德率領的第二十八團。1928 年 8 月，返湘部隊與國軍范石生部在郴州交戰，紅二十九團被擊潰，僅剩百餘人，紅二十八團也遭遇一定損失，此事件被稱為「八月失敗」。至此，湘南暴動後拉上井岡山的 5,000 農軍，除少量幹部和第二十九團的百餘人外，其餘全部損失。紅軍部隊錯失一次絕好的擴大機會。

論及「八月失敗」，後來者歸咎杜修經、龔楚（1901-1995）等人，事實上，朱德、陳毅等領導者也有一定責任。當時朱德率領的第二十八團不欲前往湘南，也不願意留在井岡山，因當地不僅食物短缺，朱毛兩部相處也不融洽。朱德想要離開井岡山，但苦於沒有明確去處而左右為難。[30]正因朱德等人的猶疑，杜修經得以乘機鼓動第二十九團士兵前往湘南，最後朱德也半推半就率第二十八團一同前往。對此，譚震林（1902-1983）回憶：

> 八月失敗，不只是杜修經的責任，朱德、陳毅同志也有責任，朱德同志是軍長，陳毅同志是軍委書記，要是他們堅持不聽湖南省委的指示，不去湘南，杜修經是無法把部隊拉走的。[31]

28 歐陽毅，〈井岡歲月今憶〉，收入李樹泉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 4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頁 51。

29 應國斌，《杜修經訪談錄》（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頁 119。

30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1928 年 11 月 25 日），收入氏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頁 25。

31 譚震林，〈回顧井岡山鬥爭歷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頁 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言不虛，當時朱德、陳毅對部隊的控制力遠強於湖南省委，若沒有他們的默許，杜修經僅憑湖南省委一紙律令，很難拉走軍隊。正如譚震林所言：「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嘛！」[32]

朱德、陳毅附和杜修經去湘南時，部隊中有一些人反對，惟未發生作用。失敗之後，這些人即以真理在握的架勢大肆攻擊朱德和陳毅，言辭十分尖銳，特務營營長宋喬生（1891-1929）批評最為激烈，要求將兩人撤職查辦。8 月 16 日，第二十八團內部總結失敗教訓時，決定給予朱德、陳毅「留黨察看 3 個月」的處分。從旁人的攻擊和最後決議可看出，朱、陳二人對「八月失敗」確負有一定責任。[33]

1928 年 8 月下旬，朱德率殘部返回井岡山，毛澤東率一個營前去迎接。因擔心第二十八團另生他心，毛澤東特地叮囑下屬部隊：不要講第二十八團的缺點，要採取團結和歡迎的態度。見到陳毅後，他又寬慰道：「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着棋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34] 8 月 23 日，朱毛兩部在湖南桂東縣召開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總結湘南失敗教訓，會中並未追究朱德、陳毅等人的責任，只是分析局勢，說明湘南不可去之理由，決定主力部隊返回井岡山。毛澤東為將朱德引導回井岡山，在言辭舉動上相當謹慎，特別留心第二十八團將士的情緒。

1928 年 9 月底，朱德、毛澤東一起回到井岡山。此時井岡山共有三個團，即朱德領導的第二十八團，毛澤東領導的第三十一團，袁文才、王佐領導的第三十二團，共約 5,000 人。1928 年 5 月朱毛初會師時，全軍近萬人，短短 4 個月即損失一半，革命隊伍消長幅度之大，由此可見一斑。追其緣由，一方面是紅軍部隊初建，規模尚小，波動頗大；另一方面則與士兵素質和組織程度有關。朱毛會師時，新增力量主要是湘南農軍，這部分人初入革命，思想尚不堅定，遇勝仗、有土豪可打時，便積極向革命靠近；但遭遇敗仗，就紛紛逃離，第二十九團、第三十團、

32 譚震林，〈回顧井岡山鬥爭歷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頁 17。

33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上卷，頁 117。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249、250。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三十三團即因而消亡。當時紅軍的政治工作及組織制度尚在發展，未能有效控制逃兵，亦是原因之一。檢視紅軍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農民武裝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現象較為普遍，被軍閥包圍的「星火」隨時有可能被撲滅。因此，紅軍後來的發展壯大充滿偶然與幸運，絕非必然趨勢。

第四支武裝力量是彭德懷、滕代遠（1904-1974）率領的紅五軍。1928 年 7 月平江起義，彭德懷拉出兩個營的兵力，並聯合周邊農民武裝組建紅五軍，下轄 5 個縱隊。後來因國民黨「圍剿」，起義部隊無法在平江一帶立足。彭德懷等人決定，由黃公略（1898-1931）率領第一、二、三縱隊留在湘鄂贛邊界，這 3 個縱隊主要由當地農軍組成，裝備差、戰鬥力弱，但熟悉地理人情，便於游擊。其餘第四、第五縱隊是拉自國民黨軍隊，算是正規軍，也是主力部隊，共 7、800 人，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前往井岡山，1928 年 12 月與紅四軍會師。至此，袁文才、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最終匯集到一處，共同組成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早的軍事武裝。

這 4 支部隊底色各異，相處起來並不融洽。袁、王自成一體，生怕被吞併，防範極嚴，雖然毛澤東派去一些政工人員，但並不能完全掌握。朱德部與毛澤東部也有隔閡，據何長工回憶，第二十八團人眾槍多，士兵優越感強，認為第三十一團多是學生兵，善辭令，多刁滑，不能打仗；而第三十一團的戰士則認為第二十八團是流氓無產階級，是「油子兵」，軍閥作風重，紀律差，兩撥人馬相互瞧不起。[35]彭德懷部上山較晚，與朱毛關係疏離，且士兵多信仰彭德懷個人，因此紅五軍基本上自外於其他部隊。[36]陳士榘後來直言不諱：剛上井岡山時，隊伍裡比較複雜，個人的心事都摸不透，[37]確為當時實際情況。

35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頁 164。

36 〈鄧乾元關於湘贛邊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對中央的報告〉（1929 年 8 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頁 340。

37 〈訪問陳士榘同志談話記錄〉（1983 年 4 月 2 日），收入黃仲芳、羅慶宏主編，《井岡山鬥爭口述史（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頁 61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初會師時，各部隊大都以自我為中心，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分團主義」。朱毛各部歷史淵源不同，槍枝武器數量差別甚大。第二十八團原是南昌起義的正規部隊，武器裝備最好；第三十一團是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主要由湘南農軍和武漢警衛團構成，武器裝備不如第二十八團；王佐、袁文才領導的第三十二團是純粹的地方性武裝，裝備最差。紅四軍成立後，原本計畫將武器平均分配到各團，但遭遇極大阻力。1928 年 6 月，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報告稱，第二十八團有槍千餘支，第二十九團僅 300 餘，第三十一團 600 餘，第三十二團 300 餘；雖然有平分武器的提議，但各團本位主義異常嚴重，對槍械尤為重視，都不肯將槍枝貢獻出來，「黨要撥一部分武裝給農民，都很難實現」。[38]無獨有偶，湘贛特委書記楊克敏（1905-1930）也有類似報告，指出紅四軍中有一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分團主義，「二十八團的槍枝與三十一團的槍枝是不平均的，屢次開會議決要平均，可是議決自議決，實際是行不通的」。在楊克敏看來，朱毛兩部「似乎有二十八團與三十一團之分別，團與團之間似有點歷史上的界限」。不過朱毛之間並沒有什麼意見，「朱毛以下的官長就難說了」；彭德懷率平江起義部隊到井岡山之後，為打破分團主義，有人提議將四、五軍混編，人員槍枝全數平均分配，但因國軍壓迫，未能付諸實現。[39]中共軍隊在發展過程中，團結與合作固然是主流面向；但各個團體之間，仍有屬於自己的獨特利益，「分團主義」即為表徵之一。

「分團主義」表面上是紅軍內部的問題，但其實是整個時代的問題。晚清以來，各武裝軍隊大都有自我中心傾向，極力攝取各種資源以自肥，不肯稍分他人。國民黨軍隊最典型的表現，即「圍剿」紅軍時自我本位，不肯援助友軍；而中共部隊不僅是「分團主義」，團以下的各層級也都

38 〈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紅軍情形、湘贛邊界特委情形、湘南情形〉（1928 年 6 月 15 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頁 129。

39 〈楊克敏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 年 2 月 25 日），《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頁 26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存在小團體傾向，利益中心非常多元化。1930 年 5 月，紅四軍軍委委員熊壽祺（1906-1971）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的狀況：部隊的小團體傾向非常嚴重，「各縱隊、各支隊、各大隊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只曉得自己這一個小團體，沒有看見整個的革命集團」。例如，要求縱隊內各支隊撥人撥槍，各支隊就不大願意，往往是把病人和損壞的槍推出來，「甚至有些部隊把人、槍藏起來，使你考查不到」。熊壽祺認為，小團體主義產生的一個重要心理基礎，是「以為我當大隊長或支隊長，這個部隊就是我的」。如果這個勢頭繼續蔓延，中共軍隊很有可能重蹈軍閥割據覆轍。當時紅四軍前委即敏銳的意識到：小團體主義是軍閥的基礎，小團體主義傾向如不糾正，將來一定可以產生軍閥的！[40]所幸，中共後來始終將「團體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問題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內。相較於國民黨，紅軍內部的分裂，或許只是時代背景中一個並不凸顯的縮影。

彭德懷上山不久，井岡山即遭國軍大規模圍攻。為打破國軍「圍剿」，紅四軍決定由朱毛帶隊下山，攻打敵後，「圍魏救趙」，迫使國軍撤兵；彭德懷和王佐、袁文才堅守井岡山。1929 年 1 月 14 日，朱毛率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約 3,600 人向贛南進軍，但沿途遭國軍強兵追擊，自顧不暇，根本無法回援井岡山。「圍魏救趙」策略失敗後，彭德懷部獨木難支，井岡山根據地很快失守，並遭致國軍殘酷清洗。彭德懷帶兵轉戰贛南，王佐、袁文才躲進深山打游擊。至此，井岡山根據地完全失守。

1927 年毛澤東上井岡山，1929 年初離去，前後一年多。期間毛澤東寫過諸多文章論述井岡山根據地的優越性，並誓言要「用全部力量與敵人爭鬥」，「決無退去拋棄」之念。[41]從狹義的軍事地理角度看，井岡

40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一九二九年七月到一九三〇年四月〉，《黨的文獻》1999 年第 2 期（北京），頁 71、72。

41 〈毛澤東給湖南江西省委轉中央的信〉（1928 年 6 月 16 日），收入總政治部辦公廳編，《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頁 75。

臺灣人文與藝術期刊資料庫

山易守難攻，適合守衛；但從更廣闊的局面看，井岡山過於貧瘠，若將根據地設在此，紅軍實難有大規模發展。當時中央及湖南省委都不看好井岡山，但毛澤東堅持己見，屢次條陳，寫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章，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等。後人對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意見奉若圭臬，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井岡山很快被攻陷，毛澤東關於井岡山可守的論斷不切實際。更為關鍵的是，自 1929 年初轉戰到贛南閩西後，毛澤東發現那裡物產豐富，守敵較弱，革命情勢遠比井岡山好。檢視史料可以發現，1929 年之後，毛澤東革命重心完全放在贛南閩西一帶，再未返回井岡山。井岡山作為紅軍的發源地固然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但在紅軍的發展歷程中，它很早就完成使命。從這個角度看，紅四軍下井岡山確如陳伯鈞所言，是「壞事變好事」。[42]

井岡山是朱毛紅軍的起源地，也是紅軍發展的第一個時期。回顧此一階段，或可總結出以下幾個特徵：其一，軍隊擴張速度並不快。毛澤東上山時帶有近千人，朱德主力部隊有千餘人，王佐、袁文才部有 3、400 人，到 1929 年離開時，主力部隊大約仍舊是此數目。其二，限於環境因素，領導者擴充軍隊的企圖心並不強烈。井岡山時期，朱毛未特別注重擴紅工作，遠不像後來中央蘇區時期之極力強調。朱德曾將湘南農軍 4、5,000 人帶上井岡山，可是這部分人並未被留下來，主要因為糧食不足。就戰略條件而言，井岡山難以供養大規模的軍事武裝，因此紅軍部隊一直處在不慍不火的狀態。其三，紅軍組建初期，各部隊山頭意識較重，尚未十分團結。王佐、袁文才部一直與朱毛部若即若離，朱毛兩部也有隔閡；彭德懷名義上歸紅四軍轄制，但實際上一直與朱毛並駕齊驅。彭德懷部後來發展為紅三軍團，朱毛部發展成為紅一軍團，共同構成紅軍主力，但這兩個軍團在戰略問題上曾屢次發生爭執。總體而言，紅軍的規模增長與各部的融合問題，要到 1930 年之後才逐步解決。

42 〈訪問陳伯鈞同志〉（1960 年 10 月 30 日），收入黃仲芳、羅慶宏主編，《井岡山鬥爭口述史（上）》，頁 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因禍得福：紅軍急劇擴張之緣由

1930 年 9 月 30 日，周恩來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表示，朱毛之所以能開啟歷史新篇章，關鍵是離開井岡山。他認為，若朱毛一直待在井岡山，是一種躲避行為，無前途可言；只有下山，「有了集中的組織」，「有了大規模的行動」，「這才有全國的政治意義，這樣方能算是紅軍」。[43]這個看法很有代表性，當時中央大多數領導人都持類似見解。1928 年前後，中央從政治影響的角度考慮，屢次催促毛澤東離開井岡山，向大城市進攻，以擴大革命影響；若只躲在山溝裡鬧革命，非但難以產生影響，還有落草為寇之嫌。而毛澤東不願離開，主要是基於戰略戰術考量，紅軍力量薄弱，難以攻打大城市，井岡山易守難攻，是軍隊落腳的好據點。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毛澤東堅守井岡山的看法非常堅定，不論中央及湖南省委如何催促，他都按兵不動。中央對此極為不滿，但山高皇帝遠，卻也無可奈何。

關於毛澤東與中央的爭論，二者都有可檢討之處。中央大員坐鎮上海，不了解實際情況，的確有好高騖遠的「盲動」傾向；毛澤東關於井岡山可守的種種論述，也純屬紙上談兵——理論意義很強，實踐效果並不佳。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是，紅軍最後並沒有守住井岡山。井岡山作為革命根據地，存在天然缺陷，一、物產貧瘠；二，在軍事缺乏足夠的迴旋與突破空間。這兩個弱點，在紅軍初期並不明顯，但隊伍壯大後，必定受其限制。[44]粟裕（1907-1984）後來評論：「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後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45]應

43 〈目前紅軍的中心任務及其幾個根本問題〉（1930 年 9 月 30 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2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1124、1127。

44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頁 214。

45 粟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頁 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見道之言。因此，從更宏觀的戰略角度上看，井岡山失守並非壞事，如周恩來所言，正是因為離開井岡山，紅軍才煥發出更大生機，這或許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

毛澤東不願意離開井岡山，除去具體的戰術考慮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環境影響。井岡山一帶的交通資訊極為閉塞，與外界難以溝通，毛澤東長久待在那樣一個小山溝，眼光很難不受侷限。檢視毛澤東這一時期的思想論說，可知其目光都是聚焦在一時一地的得失，遠不如後來宏闊。此外，從個人心理與情感角度看，毛澤東不願離開，情有可解。井岡山的部隊和地盤由他一手創建，自然非常愛護，不願輕言捨棄。但也因為此種「溺愛」，導致他看問題的眼光難以超越「保存槍桿子」這一層面，主要活動也都是圍繞著如何「保槍」、「保地」。這讓他異常小心謹慎，不敢輕易嘗試任何冒險。無可諱言，毛澤東當時是有幾分地盤意識的，中央也一度擔憂他割地稱王。因此，毛不攻打大城市和堅守井岡山等舉動，必須在這個背景下加以理解。由此觀之，中央批評毛澤東「保守」並非毫無根據。

雖然毛澤東不願離開，但面對國軍圍攻，最終不得不放棄井岡山。1929 年 1 月 14 日，紅四軍離開井岡山，1 月 20 日，在大庾與李文彬作戰失利，後循粵邊境南雄進入贛南地區，在信豐、安遠、尋鄔等地與敵軍接觸，均且戰且退。2 月 1 日，部隊到達閩粵贛交界地區，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傷兵難以安置；再加之「追兵五團緊躡其後，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情狀困苦到極點，相當狼狽。直到 2 月 11 日，在寧都大柏地打敗追兵劉士毅（1886-1982）的兩個團，危機才有所緩解。2 月下旬，朱毛紅軍到達東固地區，與江西紅軍二、四團會合，部隊稍稍休整。3 月 14 日，紅四軍打開閩西重鎮長汀，物資得到較大補充，才初步穩住陣腳。[46]

在閩西立足之後，毛澤東很快發現，贛南閩西比湘贛邊界更適合作

46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 年 3 月 20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頁 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軍事根據地。贛南閩西的地域較為寬闊，物產豐富，人口稠密，能為軍隊提供充足的人員和糧食補給；其次則為福建守軍較弱。井岡山時期，紅四軍的主要對手是湖南、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尤其是湖南軍隊，戰鬥力相當強，紅軍與之接觸，多半落居下風；而在閩西，仗顯然較好打，戰利品也豐厚。紅四軍一到閩西，即在長汀之戰中擊斃福建省防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郭鳳鳴（1893-1929），殲敵 2,000 餘人，並奪取軍服廠、兵工廠等，獲取大批物資。這對紅四軍無疑是極大的鼓舞，縱觀整個井岡山時期，未曾有過如此輝煌的勝利。佔領長汀之後，毛澤東即決心留在贛南，不再返回井岡山。3 月 20 日，他去信中央稱，紅軍之行動「以贛南閩西二十餘縣為範圍」，湘贛邊界雖然不可放棄，但軍事重心須放在贛南閩西一帶，並強調：不論紅軍到何處游擊，「惟閩西贛南區內之由發動群眾到公開割據，這一計畫是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47]紅四軍的戰略轉移，至此初步確立。

朱毛紅軍從井岡山到閩西，用時兩個多月，損失 600 餘人、200 餘槍，就部隊總規模而言（紅四軍原有 3,600 人），折損並不小。更為關鍵者，軍官犧牲的比例很大，如毛澤東所言，「因兩次損傷的結果，軍官及政治工作人員之缺乏，達於極點」，戰鬥力已不及從前。[48]總體而言，紅軍下井岡山的歷程相當坎坷，屢屢有陷入絕境的危險。中央當時對朱毛紅軍幾近喪失信心，曾建議將部隊分散到農村，隱匿起來，保存有限力量，並命令朱、毛兩同志速來中央；但毛澤東堅決不同意把軍隊打散，並頗為大膽的回應：分散軍隊「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49]從客觀環境看，當時紅軍戰士剛從湘贛邊界跑到閩西地區，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戰事失利，士兵的革命性很弱，一旦分散成小股，很容易形成大規模逃亡；再者，軍隊拆散成小股之後，極有可能被國軍分割包圍，聚

47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 年 3 月 20 日），頁 54。

48 毛澤東，〈紅軍第四軍前委給中央的信〉（1929 年 3 月 20 日），頁 56。

49 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 年 1 月 5 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頁 132。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而殲之。中央後來也承認分散紅軍的提法「是有些毛病的」。[50]由此可知，毛澤東等人頂住中央的壓力，既未去上海，也沒有解散軍隊，紅四軍才得以保全。此後，這支部隊在閩西迅速發展，奠定中共軍事力量的根基，此一態勢出乎中央逆料。

1929 年 3 月，紅四軍佔領長汀之後，鑒於部隊人員不整，以及軍、團、營的建制不利於行動，毛澤東、朱德對紅四軍進行改編，主要是把原來的軍、團、營改為軍、縱隊、支隊、大隊編制。全軍編為 3 個縱隊（每縱隊轄兩個支隊），第二十八團為第一縱隊，林彪（1907-1971）任縱隊長，陳毅任黨代表；第二十八團一部和特務營合編為第二縱隊，胡少海任縱隊長，譚震林任黨代表；第三十一團改為第三縱隊，伍中豪（1905-1930）任縱隊長，蔡協民（1901-1934）任黨代表。[51] 4 月 5 日，毛澤東向中央報告，每縱隊有 1,200 餘人，500 餘槍，全軍共 3,600 餘人，1,500 餘槍。需要注意的是，紅四軍初到贛南閩西時只有 3,000 人左右，不足一個月即補充 600 人，兵力恢復到初下井岡山時的狀態。

紅軍在贛南閩西的發展非常迅速，不僅朱毛部隊擴大，還引領武裝急速發展。由朱毛軍隊帶領發展的地方武裝，情形如下：1930 年 3 月，閩西各縣赤衛團被收集聚攏，合編為工農紅軍第九軍（後改為紅十二軍），約 3,000 人；5 月，又以地方武裝為基礎成立紅二十軍，約 1,200 人；6 月，紅四軍第四縱隊和紅十二軍第一縱隊及閩西各縣赤衛團，合編為紅軍第二十一軍，近 5,000 人。[52] 1930 年 1 月，贛南紅六軍成立（後改名紅三軍），約有 3,000 人；3 月，永新、吉水、泰和等地方武裝合編為第二十軍，約 2,500 餘人；6 月，贛西南地方武裝合編為第二十二軍，共 2,000 餘人。[53]地方武裝之所以迅速發展，是因為大革命時期留下的革命火種一直未曾熄滅；另一方面則是主力部隊到來後，創造一個相對和

5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276。
5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上卷，頁 139。
52 張廷貴、袁偉，《中國工農紅軍史略》，頁 50。
53 張廷貴、袁偉，《中國工農紅軍史略》，頁 5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平的環境，使原本處在壓抑狀態的革命者有膽量揭竿而起。

在帶動地方部隊發展的同時，紅四軍本身也在急速壯大。1929 年 6 月，長汀、永定、龍岩、上杭 4 縣地方武裝被改編為紅軍第四縱隊。9 月下旬，紅四軍各縱隊從 2 個支隊擴充為 3 個支隊，每縱隊 1,800、1,900 人，全軍共 7,000 餘人。[54]這表明，紅四軍自下井岡山後，短短半年時間，人數已擴大一倍有餘。此後幾個月，紅四軍在贛南閩西來回穿梭，到 1930 年 6 月，以紅四軍為核心的紅一軍團成立，下轄紅三軍、紅四軍、紅十二軍、紅二十軍和二十二軍，共約 16,000 人。回顧 1929 年春朱毛紅軍初到贛南閩西時只有 3,000 人，短短一年多時間即發展到 1.6 萬人，規模擴大 5 倍多。對比井岡山時期，同樣是一年多時間，但總人數並沒有太大增長。1929 至 1930 年間，是紅軍擴大的關鍵期。問題是，紅軍為何會在這段時間急速膨脹？

下述幾個原因或可作為參考，第一，贛南閩西人口資源相對豐富，能夠提供較大的補充，這應該是紅軍能在短時間內擴大的基礎。第二，國民黨全面圍剿尚未開始，朱毛紅軍在贛南閩西的壓力較小，損耗不大。但 1931 年反圍剿戰爭開始後，持續性的大規模作戰致使紅軍傷亡迅速上升，如第一次反圍剿損傷約 2,000 人，第二次反圍剿損傷約 4,000 人，第三次損傷約 6,000 人，前後共計 1.2 萬人。[55]雖然這期間擴紅不斷，充其量也只能到達「損益平衡」，軍隊總規模增長幅度不大。第三，中央政策的轉變應該是紅軍迅速擴張的最直接因素。朱毛軍隊原本的發展路徑是先培養地方武裝，再逐漸轉化為正規軍，優點是訓練出的士兵比較牢靠，且有較好的持續性。如熊壽祺所言：「地方武裝漸次擴大，漸次變為紅軍，而這個新產生的紅軍，他的基礎異常堅固，比由紅四軍本身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更靠得住。」[56]贛南特委書記劉士奇（1902-1933）

5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上卷，頁 160。

55 〈蘇區中央局 10 月 3 日自瑞金來的長電〉（1931 年 10 月 3 日至 24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3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1790。

56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頁 63。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則稱，「要擴大紅軍，只有同時加緊武裝地方，給很少的槍枝，可以成立大的部隊」，然後再抽調到正規軍，如此可保證士兵數量源源不斷。劉士奇有個很貼切的比喻：「正如剝蕎駱皮一樣，削了一層又一層。」[57]但在 1930 年前後，這一循序漸進的方式卻被打斷。

1930 年前後，是李立三主政中央的時期，中共政策急劇「左」轉。主要表現有兩點：一、要求紅軍攻打中心城市，奪取全國革命勝利；二、要求紅軍迅速擴張。中央認為「循序漸進」的方式太慢，要求把地方武裝全數整編入正規軍，1930 年底要擴大紅軍 50 萬人以上。所以，1930 年上半年，既是李立三「左」傾路線走向高峰的時期，也是紅軍在數量上迅速膨脹的高峰時期。如前文所示，很多部隊都是在這一時期創建。需要說明的是，對於中央的激進政策，毛澤東最初曾加以抵制。朱毛紅軍自井岡山時期起，都是先培養地方武裝，再抽調到正規軍，很少直接徵兵入伍。中央政策急劇轉變，毛澤東最初採消極拖延，並不積極執行。中央對此很不滿，李立三公開指責毛澤東是妨礙「猛烈擴大紅軍」的代表人物。[58]從最後的結果看，毛澤東顯然沒有抵抗住中央的壓力。紅軍數量急劇增長，並不是朱、毛二人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中央盲目推動。

中央的激進政策打亂紅軍的平穩發展步伐，此舉雖然營造一時的繁榮，實際上潛藏著隱患。中央不考察地方武裝的實際情況，統統將其劃轉為正規軍，是犧牲品質換取數量。地方武裝都是農民兵，未受正規訓練，武器也差，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游擊歷練，才適宜編入正規軍。但中央情緒急躁，不待其成熟，便盡收囊中，並不利於增強戰鬥力。彭德懷後來批評，盲目擴張，非但不能提高戰鬥力，反而浪費幹部人才，削弱部隊的整體作戰能力。[59] 1931 年 4 月，蘇區中央局會議批評李立三路

57 〈贛西南（特委）劉士奇（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0 年 10 月 7 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上冊，頁 360。

5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307。

59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 15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線時，也提及「紅軍因為過去執行猛烈的擴大，也受了相當的損害」，主要是盲目擴大，降低了品質。[60]

中央盲目擴軍導致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地方百姓大受摧殘。紅軍攻打大城市屢屢受阻，損失慘重；而地方武裝被抽空後，地主士紳的力量伺機侵入鄉村，大肆屠殺蘇區百姓，根據地損失慘重。1931 年清算李立三路線時，各根據地都曾提及這一問題。閩粵贛特委報告表示，高唱「每一枝槍都集中到紅軍去」的口號，導致地方武裝被完全抽空，無力抵擋地主士紳的進攻。[61]贛西南特委也批評，「立三路線絕對集中地方武裝」是錯誤的，把所有地方武裝編成紅軍，地方空虛，到處遭受地主武裝摧殘。[62]地方武裝主要用來鎮壓地主士紳，是維護蘇維埃內部秩序的基本力量，一旦抽空殆盡，則蘇區內部便非常脆弱，地主士紳很容易有可乘之機。

1930 年底，李立三路線遭到全面批判，抽調地方武裝的步伐因而得以放緩。此時，由朱毛部和彭德懷部共同組建發展的紅一方面軍已接近 40,000 人。1929 年 4 月，朱毛部與彭德懷部在瑞金會師時只有不到 4,000 人（朱毛部約有 3,000 人，彭德懷部 800 人），紅軍部隊在兩年內急速增長近 10 倍。至此，井岡山上的星火真正開始呈現燎原之勢。總結促使紅軍急劇發展的兩個要因——根據地轉移和中央政策「左」傾，這兩個因素實際上都不在毛澤東的計畫之內，甚至有違其初衷。再次提示我們，革命之成功並非必然趨勢；陰差陽錯的機遇，也許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

60〈接受國際來信及四中全會決議的決議〉（1931 年 4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 304。

61〈中共閩粵贛特委常委第一次擴大會的決議〉（1931 年 2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 282。

62〈贛西南的（綜合）工作報告〉（1931 年 9 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 4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增長的極限：紅軍後期的發展情勢及其困境

李立三倒臺之後，紅軍進入反「圍剿」時期，總規模大致趨於穩定。總覽蘇區紅軍的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29 年到 1930 年底，即前文所述的急速增長階段；第二階段，1930 年底到 1931 年底，紅軍歷經三次反「圍剿」作戰，兵員有一定消耗，又受反「李立三路線」影響，擴紅節奏趨緩。截至 1930 年 9 月底，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紅軍部隊並無大幅增長，有些部隊甚至削弱。第三階段，1931 年底到 1934 年，暨中央蘇區政府成立到紅軍長征前，中央政策再次趨向激進，強化擴紅力度。在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紅軍與國軍大打消耗戰，損失慘重。總體而言，此階段的特徵就是巨量徵兵、巨量損耗，強迫入伍與開小差現象大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可以說，紅軍在第三階段的發展情勢，既彰顯中共黨人極強的動員能力，也呈現戰爭的兇殘面目。下文將詳細論述最後一階段的擴紅形勢。

（一）巨量徵兵、巨量損耗

蘇區中央政府成立後，有五次大規模擴紅。1931 年 11 月，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要求紅軍第一、三軍團近期內至少要擴紅 10,000 人。[63] 12 月 25 日，中央局發布《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案》，細緻規定相關任務：1932 年 1 月到 3 月，進行第一次擴大紅軍運動，江西、閩西擴大 1.5 萬人，湘贛蘇區 3,000 人；湘鄂贛 5,000 人，總計 2.3 萬人。此次擴紅的顯著特點是改變以往從地方武裝向正規軍發展的形式，決議案明確指示：可以直接吸收工農分子參加紅軍，不必經過地方武裝這一過渡。[64]中央驟然

63 〈紅軍問題決議案〉（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3 卷，頁 1856。

64 〈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案〉（1931 年 12 月 25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改弦更張，意圖明顯，就是要快速壯大紅軍。在中央看來，擴紅若「要先經過地方武裝階段」，進度緩慢，是保守觀念。[65]為加速擴紅，中央命令成立補充團，訓練日期「少則一星期，多則 20 天」，然後即可整體送到前方去。[66]就軍事發展而言，中央的政策在 1932 年之後明顯趨向激進，整體革命思路又回到「李立三時代」。

1932 年初第一次擴紅運動開始後，蘇區的擴紅徵兵幾乎不曾停歇。例如，第一次擴紅在 4 月份結束，5 月旋即定為「擴大紅軍突擊月」，要求擴紅 7,000 名。稍息一個月後，7、8、9 三個月開始第二輪擴紅，中央局要求整個蘇區在此時間段內擴大紅軍 4.27 萬人，數量幾乎等同既存紅軍總數，表示紅軍要在 3 個月內擴大一倍。第二輪擴紅中，各地區承擔的具體人數如下：江西 1.77 萬人，福建 0.65 萬人，湘贛蘇區 1.5 萬人，湘鄂贛蘇區 0.35 萬人。[67]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輪擴紅中，已經出現不能按期完成的現象。1932 年 9 月，中央局檢查發現，江西、福建兩省的擴紅成績「極不能令人滿意的」，江西只達到原定計畫之半數，而閩西僅及原定計畫十三分之一。[68]這並不令人意外，畢竟擴紅的節奏實在太快、太兇猛，蘇區人力不可能跟得上。

1932 年 10 月，蘇區開始第三輪擴紅，仍然為期 3 個月，到 1933 年 1 月結束。1932 年到 1933 年初，全中央蘇區共計畫擴紅 8.76 萬人，幾乎是現有紅軍人數的兩倍。當然，計畫的人數沒有全部完成。1933 年初，中央批評，在發展紅軍、籌備戰費等問題上，「許多動人的偉大的數目

的系統》第 3 卷，頁 1944。

65 〈中央局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1932 年 9 月 7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 2341。

66 〈蘇區中央局戰爭動員與後方工作計畫〉（1932 年 6 月 22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頁 2243。

67 〈蘇區中央局戰爭動員與後方工作計畫〉（1932 年 6 月 22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頁 2242。

68 〈中央局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1932 年 9 月 7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頁 2336。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字是決定了，寫在訓令上計畫上了。然而工作也就從此沒有下文了」。[69]擴紅成績在實踐中「沒有下文」，只體現在數字上，是為蘇區最大的困境。

1933 年初第三輪擴紅剛結束，中央又在 1933 年 2 月 8 日提出「在全中國各蘇區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口號，隨後掀起第四次擴紅熱潮，一直持續到 1933 年底。這一次擴紅的特點與李立三時期相類，主要是把地方武裝整團、整連的編入正規軍。如 6 月 11 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擴大紅軍問題的訓令》，極力呼籲整團、整師的赤衛軍、少先隊加入紅軍。並且宣稱擴大百萬鐵的紅軍，成為目前頭一等的實際戰鬥任務，「誰不瞭解這一任務的重要」，或是對執行這一任務發生任何猶豫，「都是極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70]在此背景下，興國模範師、勝利模範師等地方部隊紛紛回應中央號召，全體加入正規軍，紅七軍團、紅九軍團也在這一氛圍下成立，紅軍在編制和兵員數量可說達到頂峰。其時，蘇區紅軍共有 5 個軍團，加上地方部隊，合計約有 10 萬人。在中央的高壓下，擴紅勢頭看似猛烈，但當時中央蘇區的總人口也就 300 多萬，要抽出 100 萬人當兵，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與李立三時代一樣，不顧實際情況，大跨步式的跳躍發展，必然導致臨時拼湊的部隊外強中乾，甚至虛有其表，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部隊實際人數與計畫人數嚴重不符。1933 年 6 月 15 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頒布《中國工農紅軍暫行編制表》，規定步兵連編 141 人，營編 443 人，團編 1,700 餘人，師編 6,000 餘人，軍團編約 20,000 人。[71]當時紅軍部隊中最有實力的是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各約有 15,000 人，尚不能滿員，其他軍團可想而知。最不堪者，新組建的紅七軍團只有 3,500 人左右，僅 2 個團的兵力，距軍團額定人數相差甚遠。1933 年 12 月 23 日，周恩來即批評：紅七軍團號稱有 5 個團，但事實上極不充實。人數少，

69 〈自我批評〉，《鬥爭》第 2 期（1933 年 2 月 4 日，江西瑞金），頁 11。

70 〈擴大紅軍問題的訓令〉（1933 年 6 月 11 日），收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編印，《軍事文獻．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 1 冊（內部出版，1942），頁 313。

71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第 1 卷，頁 292。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組織架構龐大，以致指揮及後勤工作非常不便，行軍時伙食擔子比戰鬥部隊還長。[72]此外，紅九軍團下屬各團的實際人數只有 7、800 人，僅達到規定編制的一半。[73]就編制規模而言，第四次反「圍剿」之後，紅軍的「花架子」達到最高峰，很多部隊空有其表，武器裝備、人員數量都未達應有水準。黃克誠後來批評：在「左」傾的氛圍下，領導人「總是把肥皂泡吹得滿大」，「盡幹那種自欺欺人的蠢事」；「表面看起來主力紅軍編制擴大了」，「但實際上是擺空架子，徒有虛名」。[74]可以說，第四輪擴紅，紅軍人數又一次膨脹，但實際戰鬥力卻未大幅提升。

蘇區的第五輪擴紅運動，從 1933 年底開始，直到長征轉移前結束。這是蘇區最後一次大規模擴紅，主要是應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蘇區最後一年，人力、物力已極度匱乏，但在「寸土必爭」、「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政策下，紅軍與國民黨大打消耗戰，兵員需求極大。到 1934 年 7 月，中共已擴紅 11 萬餘人，在長征前的最後兩個月，又突擊擴紅 18,000 人。最後一階段的擴紅，可謂竭澤而漁。

據《中央蘇區軍事史》統計，在整個擴紅運動中，僅贛南 13 縣，參加紅軍的人數就達到 33.1 萬。[75]各縣總人口及擴紅人口約略統計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見，瑞金、興國、寧都、雩都等革命中心區域，參加紅軍人數近乎占到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顯示絕大多數成年男性都被徵召入伍。毛澤東在長岡鄉、才溪鄉的調查亦可為此提供佐證。在長岡鄉，16 歲到 45 歲的成年男子共 407 人，外出當紅軍的有 320 人；才溪鄉有成年男子 554 人，外出當紅軍 485 人。[76]此外，據邱會作回憶，在其家鄉興國縣，1928 年蘇維埃運動開始時有 23 萬人，到 1934 年紅軍退出後，

7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上卷，頁 362。

73 羅炳輝，〈九軍團人員武器統計〉（1934 年 3 月 30 日），收入氏著，《羅炳輝軍事文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頁 130。

74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130。

75 凌步機，《中央蘇區軍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412-413。

76 毛澤東，〈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1934 年 1 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頁 338。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期刊資料庫

銳減到不足 15 萬人，全縣戶口平均減少四分之一以上。他所在的村莊，蘇維埃革命前有 40 戶人家，解放後只有 19 戶，減少二分之一多。[77] 邱會作提供的人口衰減數據比前文提及的擴紅人數稍多，這是因為有一部分人雖未參加紅軍，但在戰爭中犧牲或被殺，如紅軍家屬、革命婦女等。

表一　贛南 13 縣參加紅軍人數

單位：萬人

縣　名	瑞金	興國	寧都	雩都	贛縣	會昌	石城	安遠	尋鄔	上猶	信豐	崇義	南康
總 人 口	24	23.2	27.4	34	15.9	24	13.6	10	12	10	20	9	23
紅軍人數	4.9	5.5	5.6	6.8	1.1	3.9	1.6	1.3	0.6	0.2	1	0.2	0.4

資料來源：凌步機，《中央蘇區軍事史》，頁 412-413。

無可諱言，整個蘇區時期，紅軍的消耗量非常巨大。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從第一次反「圍剿」開始後，紅軍就不停徵兵，但軍隊總規模卻未顯著增加。1931 年底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後，蘇區紅軍約有 40,000 人，其後兩年多，中共發動 5 次大規模擴紅運動，僅贛南就有 33 萬多人入伍，而長征前，紅軍總兵力卻只有 80,000 多人，其消耗量可想而知。傳統革命史的敘述中，多側重於強調殲敵人數，很少提及紅軍的犧牲和損失。事實上，戰爭的圖景，絕不只是一幅簡單的素描像。擴紅動員來的兵最後魂歸何處？值得深思。

綜前所述，蘇區的青壯年幾乎都參加過紅軍。中共如此強大的動員能力如何練就？強大的組織體系，加上軟硬兼施的手段，應是其中關鍵。相較於歷史上的政黨，中共最突出的地方，不僅是將其組織深入到鄉村一級，而且是直接面對個人與家庭。在擴紅動員中，從省委到區縣，到鄉村，再到個人與家庭，都背負著任務和壓力，層層傳輸之下，個人最後直接面向組織，反抗餘地極為有限。中共並不是一開始就施硬要強，

77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頁 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盡可能以柔和的手段，鼓勵群眾自願參軍。事實上，最初階段有打土豪分田地的物質誘因，群眾積極參軍；而且在宣傳與技巧上，中共也頗費心思，努力爭取群眾自覺自願參加革命。這一切都促成中共與群眾關係的良好開端。然而，任何事情都有限度，自覺自願者入伍犧牲之後，革命尚未成功，部隊需要繼續補充，軟性的鼓動宣傳已經發揮不出多大效力，強制手段便潛藏在宣傳話語背後，悄然無聲而又凌厲無比的施展開來。

（二）難以為繼的革命：以黨員和婦女為中心的觀察

蘇區後期擴紅中存在大量強迫入伍現象，現存研究已有所討論，本文不擬重複描述。關於後期擴紅情形，下文嘗試從黨員與婦女的角度出發，通過考察他們對擴紅的因應，豐富既有認知。

國共分裂不久，中共中央就要求黨員須接受軍事訓練，實行黨員「軍事化」，但成效不佳，充其量只是口號。蘇區後期，因兵員缺口很大，中央的目光再次瞄準黨員。1932 年，中央明確指示抽調十分之一的黨團員去當紅軍。[78]按常理講，黨員是革命的主體，在擴紅運動中，他們理應有積極的表現，事實卻不然。

黨員不願入伍的首要原因就是戰爭太危險。前方戰場槍林彈雨，生活艱苦，黨員通常都會以地方事務繁重為由拒絕。1932 年 10 月，雩都縣委即批評，一般黨支部中普遍存在太平享樂的觀念，「黨員怕調動工作，特別是怕當紅軍」。[79]另外，在心態上，一些黨員以菁英幹部自居，認為上前線打仗是普通民眾的事，不應由他們承擔。如果說蘇區黨員有什麼特權，那就是他們憑藉主持地方工作的便利，極力推遲或拒絕參加

78 〈中央局關於擴大紅軍的決議〉（1932 年 9 月 7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頁 2340。

79 〈中共雩都縣委七、八、九三個月工作總結——各縣革命競賽工作報告之十二〉（1932 年 10 月），收入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二）》（內部出版，1992），頁 2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紅軍。可以說，黨員並未帶頭響應擴紅。

檢視史料即可發現，蘇區黨員拒絕入伍的現象非常普遍。1933 年 3 月，湘贛省委報告，許多黨團員不願當紅軍，在會議上默不作聲，或者空喊口號，鼓動他人去，自己找種種藉口躲避。再則，動員會議上，因徵兵人數不達標，便長時間不散會，「弄得有人會也不到了」。[80]湘鄂西蘇區報告黨內情況時，指出第一個問題就是「黨員不願參加紅軍」。[81]河西道委也有類似報告，稱最嚴重的問題是黨團員害怕當紅軍。[82]江西蘇區的情形更糟糕，據省委稱，「黨團員不願去當紅軍的現象，除少數縣外，差不多成為一般的現象」，一些地方還出現「群眾因為避免加入紅軍而入共產黨的怪現象」，「甚至萬泰、雩都有兩區的黨員，聽到黨員應領導去當紅軍，他寧肯出黨」。[83]閩粵贛省委則批評：「有很多同志沒有鬥爭決心，聽到擴大紅軍要黨員去，就怕得要死。」[84]以上各蘇區報告都提到「怕」，可見，即便是黨員，面對流血犧牲，還是非常畏懼。由此不難推想，普通百姓的心態必定更退縮。

面對黨員的退縮，中央屢次批評糾正，但效果不佳。1932 年 3 月，中央局明確指示湘贛省委，「要嚴厲打擊那黨團員不當紅軍的極端錯誤

80 〈中共湘贛省委關於湘贛蘇區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的工作報告——從去年 11 月 21 日至 2 月 20 日〉（1933 年 3 月 8 日），收入江西省檔案館選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 342。

81 〈關於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 年 12 月 19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4 年》（內部出版，1985），頁 326。

82 〈中共河西道委給蘇區中央局的綜合工作報告〉（1932 年 5 月 17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江西省檔案館編印，《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內部出版，1992），頁 112。

83 〈中共江西蘇區省委四個月（一月至四月）工作總報告〉（1932 年 5 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頁 139。

84 〈中共閩粵贛省委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接受中央要在三個月內發展紅軍一萬五千人的指示〉（1932 年 1 月 11 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內部出版，1985），頁 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觀念」。[85] 9 月，蘇區中央局明確表示：拒絕黨和團徵調的分子，「應該受到全黨全團的布爾塞維克的打擊，與紀律上的制裁」。[86] 11 月，湘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為提高黨的戰鬥力，「首先就應做到實行全體黨員軍事化」；其次，「各級黨部的書記或得力常委都要兼任赤衛軍的政治委員，黨員應加入赤衛軍，隨時聽候黨的徵調到紅軍中去與自動的加入紅軍，消滅過去黨員怕當紅軍的壞現象」。[87]從中央到省委都嚴厲催促，蘇區依然難以抽徵到足夠的黨員。如萬泰縣，全縣黨團員有 4,000 人，1932 年 3 月整個月當紅軍的只有 4 人，勝利縣也只有數十人，「這還是較好的縣份」。[88]寧都縣委在 1932 年 10 月則報告之前數月的擴紅運動中，只有 146 名黨員、200 多名團員響應，而原本計畫人數為 3,500 名以上；「九一八」運動中，本要徵調十分之一的男性黨團員，實際上只調到 10 人，還不是自願的。在固村區，某支部黨員聽到要十分之一的人當紅軍，竟帶家屬躲藏上山。[89]

無可諱言，蘇區後期，很多黨員都躲避入伍，有些人甚至不敢來開會。[90]面對此種局面，地方黨組織為完成任務，只能採取強迫方式。如公略縣委報告，許多地方採強迫命令，部分鄉區黨團員因恐懼當紅軍，「許多同志怕來開會」。[91]而永新縣委為迫使團員參軍，規定不當紅軍

85 〈蘇區中央局給湘贛省委信〉（1932 年 3 月 4 日），收入《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 233。

86 〈中、少共蘇區中央局告全蘇區黨員團員書〉（1932 年 9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4 卷，頁 2379。

87 〈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共湘贛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四日通過〉，《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65。

88 〈關於紅五月工作的決議案〉（1932 年 4 月 2 日），《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3 卷，頁 2125。

89 〈中共寧都縣委七、八、九三個月工作報告〉（1932 年 10 月 7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二）》，頁 122、123。

90 〈中共寧都縣委兩個月（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衝鋒工作報告〉（1932 年 12 月 26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二）》，頁 497。

91 〈中共公略縣委十一月份工作報告〉（1932 年 12 月 17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就剝奪公權、沒收土地。[92]可見，強迫擴紅現象在黨組織內部也大量存在，不只在群眾中。如果說黨團員是最後的護城河，那麼到戰爭後期，這最後的革命源泉也要被抽空殆盡。

黨員是革命的中堅力量，表現本應該最為積極，連他們也集體逃避入伍，可見擴紅之艱難。黨員的舉動其實暗示中共的動員能力已達到極限，當組織內部開始出現「反動」，意味著革命實難再進一步。黨員的「反動」也提示另外一些問題，即組織動員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如果連黨員都無動於衷，一般群眾又作何反應？進一步的問題是，動員大會通常由黨員同志主持，如果連主持者自己都不信，則組織動員的種種場景，會不會是一場共謀性的「表演」？動員群眾和黨員都涉及強迫與暴力，如果說動員的效果有限，那麼革命的底色到底是什麼？這些問題已溢出本文的討論範圍，但的確值得思考。

擴紅動員中，婦女的角色也很曖昧。通常的想像中，都是婦女熱情送子、送郎當紅軍。李維漢即回憶稱「我親眼看到擴大紅軍的情景」，「到處出現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當紅軍的盛況」。[93]福建省委宣傳部長郭滴人談到婦女在擴紅工作中的活躍情景時也說：

> 在支部討論擴大紅軍時，有些男同志不敢發言，大多女同志，你一句我一句向他突擊。或者有些同志發表不正確意見，女同志很有力的批評他。在群眾會上婦女突擊隊，指男人的名字，唱山歌鼓動他當紅軍，鼓動逃兵歸隊。[94]

表面上，婦女對擴紅工作非常積極，但有三點需要注意：其一、表現積極的婦女大都已是組織中人，擴紅是她們的任務，不得不積極；其二、加入組織的婦女畢竟是少數，不能代表社會的總體氛圍；其三、表現積

1932 年（二）》，頁 395。

92 〈團湘贛省委第二次委員擴大會決議〉（1932 年 3 月 17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 358。

93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頁 342。

94 郭滴人，〈長汀最近擴大紅軍所得的經驗〉（1933 年 4 月 5 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頁 28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極者大都是動員別人家的男人去當紅軍，並非催促自己的孩子或丈夫，若是輪到自己家，或要另當別論。

蘇區婦女其實很留戀自家男人。1932 年 8 月，湘贛省委即批評，「在擴大紅軍另有一種嚴重現象，就是婦女留戀他的丈夫，不要他去當紅軍」。[95]大約同時期，江西婦聯也號召：「消滅過去阻止丈夫或兒子去當紅軍的現象，使廣大勞動婦女能自動的送郎送子去當紅軍。」[96]毫無疑問，「號召」是從反面表徵婦女的覺悟還不夠。實際上，「號召」的作用並不大，婦女阻攔家人當紅軍的現象比比皆是。例如，勝利縣[97]縣委就報告，擴紅消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婦女不但不幫助擴紅，「甚至阻止她們的兄弟、老公去當紅軍」。[98]瑞金縣委也有類似報告，稱婦女工作沒做好，「有婦女拉衣衫尾的，不肯他的老公當紅軍」，「鼓動老公男子去當紅軍的當然是很少」。[99]關於婦女在擴紅的表現，後來的革命史敘事總傾向於用一些個別的典型事例，烘托或營造全體婦女的概況。但若返歸革命現場，我們必須承認「鼓動老公男子去當紅軍的當然是很少」這一事實。革命史研究中，「典型事例」與「普遍事實」應該有所區分，否則很容易一葉障目。

然而，婦女為何極力阻攔家人當紅軍？情感與物質上的雙重需要，應該是關鍵原因。在當時的生產條件下，男性勞動力擔負全家生計，一旦他們被抽調入伍，婦女獨自在家的生活便成問題。畢竟，耕田種地都不是婦女所能獨自完成的，尤其是一些小腳婦女，因為難以下地幹活，

95 〈擴大紅軍與健全地方武裝決議案——湘贛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之五〉（1932 年 8 月 1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頁 550。

96 〈全省婦運衝鋒季工作計畫——全省婦委書記聯席會通過〉（1932 年 7 月 3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頁 310。

97 勝利縣於 1932 年由興國縣東北部和雩都縣北部析置，1934 年 10 月紅軍長征後裁撤。

98 〈中共勝利縣委給中共中央局的報告——六月份的工作綜合報告大綱〉（1932 年 7 月 10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頁 315。

99 〈中共瑞金縣委七月份工作報告——附「八一」示威運動工作總結〉（1932 年 8 月 9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頁 385。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藏資料庫

對男人的依賴更深。1932 年 8 月，勝利縣委即報告，古龍崗、江口一帶的小腳婦女很多，雖然鼓勵放足，但她們不聽，「坐在家裡好像寄生蟲」，不做革命工作，專靠老公、兒子養活。縣委不無侮辱的批評：阻止男人去當紅軍的，「也就是這些小足婆最厲害」。[100]從革命的角度看，依靠男人過活的婦女的確是累贅；但對婦女來講，千百年來的生活都是「男主外女主內」，依靠男人是天經地義。況且，蘇區對男性勞動力的徵發確已到極端地步，連一些地方黨部都認為「蘇區壯丁少」，持續徵兵「對生產有妨礙」，斷言「不能再擴大紅軍了」。[101]總體而言，婦女的基本生活因大量徵兵而受到嚴重威脅，所以，送郎、送子當紅軍的景象不可能普遍發生。

為解決留守婦女生活問題，蘇區曾組織互助社，展開優待紅軍家屬活動，主要是發動群眾幫助她們耕田種地。毛澤東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表示，大量壯丁外出，不會影響鄉村生產，「因為勞動互助社、耕田隊及其他一切的辦法，有組織有計畫地調劑了鄉村的勞動力，解決了紅軍家屬每一個困難的問題」。[102]若只從文句上看，紅軍家屬的生活問題似乎有解決之道，但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的用意是為鼓動群眾當紅軍，這番話帶有很強的宣傳性，並非真實情況。

群眾之間的「互幫互助」雖然存在，但其效果不能高估。例如，1932 年江西蘇區報告，各級黨與政府對執行紅軍優待條例很消極，有些政府工作人員表示「紅軍擴大多了難得優待」，有的紅軍家屬因得不到幫助而做了叫花子。[103]閩粵贛省委也指出：優待紅軍家屬工作做得不好，「不是群眾熱烈自動來做」，非得要蘇維埃打條子「輪流指派」，即便如此，也「做得馬馬虎虎」。一些人「到田裡不努力，田做得不好」；還有些

100 〈中共勝利縣委關於七月份工作情形給中共中央局的報告〉（1932 年 8 月 7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頁 379。

101 〈中共湘贛省委給中央局的報告〉（1932 年 10 月 17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頁 384。

102 毛澤東，〈武裝民眾與建設紅軍〉（1934 年 1 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頁 338。

103 嚴仲，〈三個月擴大紅軍的總結與教訓〉，《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頁 66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人「一天等一天不去做，紅軍家屬到鄉蘇請都請不到」。[104]閩粵贛團委則直言不諱，群眾對於幫助紅軍家屬耕田種地等事務極不情願，「擁護紅軍委員會」基本上只是形式組織，省一級開會、決議、發通知，但下層卻很少實際工作。[105]

紅軍家屬遭冷遇，中共批評說是因為群眾思想覺悟不高，但其實這與思想認識無關。關鍵原因是，當時蘇區百姓大都面臨食不果腹的困境，很難再有餘力幫助他人。當家家戶戶都已自身難保時，不可能去作幫扶工作。1932 年 7 月，閩粵贛省委即批評，各級黨部、團體負責人對優待工作「不注意已達極點」。[106] 9 月，瑞金縣委則報告，一些地區「甚至要負責人拖槍去壓迫群眾，才去幫助紅軍家屬耕田」。[107] 10 月，會昌縣委報告，耕田隊組織非常渙散，禮拜六幫助紅軍家屬工作僅有部分實現，大半是敷衍的狀態。[108]以上列舉的事例都出現在 1932 年下半年，這還不是蘇區最困難的時期，到 1933、1934 年，情形無疑更為糟糕。所以，毛澤東講互助組「解決了紅軍家屬每一個困難的問題」，只能理解為宣傳鼓動的話語，並非實際情況。

婦女阻攔男子當紅軍的另一個原因與情感上的需求有關。丈夫外出參軍，多半有去無回，婦女在家守寡，心情相當苦悶。1932 年 5 月，紅三軍團在徵兵過程中發現，許多青年婦女「不願嫁給青年人而願意嫁給老頭子」，「原因是怕青年丈夫靠不住要去當紅軍」。[109]湘贛蘇區則報

104 〈中共閩粵贛省委擴大紅軍問題決議——接受中央要在三個月內發展紅軍一萬〉（1932 年 1 月 11 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頁 8。

105 〈團閩粵贛省委三個月工作報告——蘇區團代會到四月的工作狀況〉（1932 年 5 月 20 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頁 160。

106 〈中共閩粵贛省委通知第八號——糾正忽視擁護紅軍委員會工作的現象〉（1932 年 7 月 22 日），《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頁 207。

107 〈中共瑞金縣委八月份工作綜合報告〉（1932 年 9 月 16 日），《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二）》，頁 48。

108 〈中共會昌縣委七、八、九三個月工作總結報告——中央蘇區各縣革命競賽工作報告之七〉（1932 年 10 月），《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二）》，頁 242。

109 〈紅三軍團政治部關於崇猶兩蘇區路線和紅軍情況的報告〉（1932 年 5 月 15 日），《湘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告稱，新（淦）峽（江）縣的一些婦女公開宣傳「不要和紅軍結婚」，「因為紅軍犧牲了沒有靠」。[110]當時蘇區政策對紅軍的婚姻非常保護，軍嫂很難離婚；惟紅軍戰士常不在家，軍嫂情感無所寄託，與人私通的情況非常普遍。1933 年 1 月，湘贛蘇區婦女部報告指出，「紅軍老婆，湘贛蘇區當紅軍的，自朱毛紅軍在永新時帶了許多到河東去，現有五六年的沒有信不知怎樣，有許多要求離婚，鬧得非常厲害」，不准她離，她總是天天鬧，「或者私生小孩」。[111]更甚者，永新里田區竟有紅軍老婆「公開說要偷人的怪事」。[112]無可諱言，女性的情感需求與擴紅動員是相衝突的。雖然蘇區一再號召鼓動「送郎當紅軍」，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婦女的熱情不可能很高漲。

雖然中共極力動員，但下級百姓的隱性抗爭相當強烈。黨組織內部擴紅遭到巨大阻力；周邊的婦女也不十分擁護，遑論士兵本身的逃避與反抗。面臨此種局面，中共只能施以強硬手段。例如，湘贛蘇區規定團員不當紅軍就剝奪公權、沒收土地；[113]甚至有人提議，「群眾動員不起來，只有到他家裡去吃飯，只有包圍房子」。[114]對於開小差者，若勸說後仍不願意歸隊，「則當收回其軍衣被毯及一切軍用品，並責成賠償」，「並罰他多替紅軍公田或紅軍家屬耕田做事」。[115]為迫使群眾入伍，

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頁 415。

110 〈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通令（第十六號）——實行婚姻登記與正確執行婚姻條例〉（1933 年 5 月 12 日上午於永城），《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394。

111 〈中共湘贛省委婦女部給中央婦女部的報告〉（1933 年 1 月 7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221。

112 〈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通令（第十六號）——實行婚姻登記與正確執行婚姻條例〉（1933 年 5 月 12 日上午於永城），頁 394。

113 〈團湘贛省委第二次委員擴大會決議〉（1932 年 3 月 17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頁 359。

114 〈關於接受五中全會決議及中央給湘贛省委指示信的決議——中共湘贛省委第一次執委擴大會通過〉（1934 年 3 月 26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699。

115 〈中共湘贛省委關於歸隊運動——工作方法之一〉（1933 年 5 月 16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397。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中共可謂窮盡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以屠殺相威脅。193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明確規定：拖槍逃跑者，一經捕獲，就地槍決；組織逃跑者，逮捕後經公審槍決；屢次逃跑、造謠破壞紅軍及歸隊運動者，逮捕後送法庭判處有期徒刑直到槍決。[116]中共為擴大紅軍和阻止逃兵，的確殺了不少人。1944 年，任弼時（1904-1950）回顧蘇區時代的革命情形時坦承：「在擴大紅軍方面槍斃的人還少，動員逃兵歸隊方面槍斃的人就多一些。」[117]在中共的宣傳話語中，革命是群起而擁護，但返歸歷史現場，或可發現，革命及其屬下的軍隊都已達到增長的極限，實難再進一步。

結語：捲土重來未可知

從 1932 年到 1934 年，蘇區進行 5 次大規模擴紅。擴紅前期，人民群眾尚有熱情；愈到後期，徵兵無疑越來越困難。例如，1933 年 1 月，湘贛省委即報告，此前擴紅尚可取得一些成績，但現在就表示沉寂，「特別是有些報了名，而不能真正兌現，影響到各地擴大紅軍的數目，許多縣份尚不能完成三分之一」。[118]部分地方黨也認為「蘇區壯丁很少，對生產有妨礙，不能再擴大紅軍了」。[119]但在戰爭的強大壓力下，蘇區必須要有足夠的軍隊才能對抗國民黨進攻。對於擴紅的艱難情勢，中央不是不了解，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只能強硬推進。當時毛澤東亦主張強力擴紅，他在 1934 年 1 月召開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明確表示：「一

1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卷，頁 417。

117 任弼時，〈在湘贛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1944 年 10 月 26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下）》，頁 827。

118 〈中共湘贛省委關於紅軍新勝利與我們的緊急工作〉（1933 年 1 月 15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頁 252。

119 〈中共湘贛省委給中央局的報告〉（1932 年 10 月 17 日），《湘贛革命根據地（上）》，頁 384。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切以為群眾不願意當紅軍，或者以為在新區邊區等處不能擴大紅軍的機會主義的說法」，「事實已證明是錯誤的」。[120]其他蘇區領導人，如張聞天（1900-1976）、博古（1907-1946）、周恩來等，也都表達過類似意見。但等到達延安之後，他們對蘇區時代「窮兵黷武」的政策有不一樣的看法。如毛澤東在 1936 年總結紅軍十年戰爭經驗教訓時提出，徵兵問題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另一方面要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以及整個反『圍剿』戰役中士兵消耗的可能限度。」[121]毛澤東並非後知後覺，1934 年時他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只是迫於戰爭形勢，不可能對外公開闡述此種見解。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後，紅軍開始艱難的長征之行，最後到達陝北時，只剩下幾千人，與朱毛初上井岡山的情景非常相似。中共革命經歷大起大落的輪迴之後，似乎又回到原點。但事實上，蘇區革命雖然未能成功，但中共經此歷練，在軍事上積累豐富的經驗，為日後再次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礎。若以比較的視野來看，自「五四」運動以來，與中共幾乎同時成立的政黨團體中，沒有一個握過槍桿子，唯有中共白手起家，練出一支軍隊，相當不容易。即便放在世界範圍內比較，中共也是很獨特的。1936 年，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 1905-1972）與毛澤東交談後感歎：無論紅軍遭遇怎樣的挫敗，放入世界歷史中看，中共的成就仍然不可小覷。斯諾稱：

> 如果我們沒有忘掉在一九三七年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十六歲的青少年，那麼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小了。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而且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以擁有一支自己

120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 年 1 月 24 日-25 日），收入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第 8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頁 1315。

121 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6 年 12 月），《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頁 722。

臺灣人文思想研究會收藏

> 的軍隊而自豪的共產黨。[122]

毛澤東自己也談到：

> 世界範圍內，還只有蘇聯、中國、西班牙三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三個軍隊，是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國的黨都還沒有軍事經驗，所以我們的軍隊和軍事經驗特別值得寶貴。[123]

暫且不論這支軍隊是否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僅就毛澤東指出的中國和蘇俄兩國的共同性觀之，一旦共產黨擁有自己的軍隊，而且不斷從中吸取教訓，無疑就為其日後捲土重來提供重要保證。

（責任編輯：歐陽宣　石昇烜　校對：洪麗崴）

122 吳黎平編，《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 40。

123 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 年 11 月 6 日），收入氏著，《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 549。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自我批評〉，《鬥爭》第 2 期，1933 年 2 月 4 日，江西瑞金，頁 11-12。

《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

《湘贛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協作小組編，《湘贛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

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

中央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編印，《湖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縣委、蘇維埃、群眾團體）1927 年-1933 年》。內部出版，1984。

中央檔案館編，《閩粵贛革命歷史文件匯集（1932-1933 年）》。內部出版，1985。

中央檔案館、湖北省檔案館、湖南省檔案館，《湘鄂西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中央分局文件）1931-1934 年》。內部出版，1985。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5 冊（一九二九）。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

中央檔案館、江西檔案館編印，《江西革命歷史文件匯集 1932 年（一）、（二）》。內部出版，199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編印，《軍事文獻．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 1 冊。內部出版，1942。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央檔案館編，《八七會議》。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親歷南昌起義》。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黨的系統》，第 2-4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贛州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中共龍岩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歷史資料文庫·政權系統》第 8 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黨史資料徵集編研協作小組、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澤東，《毛澤東軍事文集》第 1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中、下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江西省檔案館選編，《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李樹泉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 4 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吳黎平編，《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等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何長工，《何長工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11。
彭德懷，《彭德懷自傳》。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粟 裕，《粟裕戰爭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黃仲芳、羅慶宏主編，《井岡山鬥爭口述史（上）、（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黃克誠，《黃克誠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熊壽祺，〈紅軍第四軍狀況——從一九二九年七月到一九三〇年四月〉，《黨的文獻》1999 年第 2 期，北京，頁 53-75。
劉樹發主編，《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應國斌，《杜修經訪談錄》。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4。
總政治部辦公廳編，《政治工作歷史資料選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聶榮臻，《聶榮臻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羅炳輝，《羅炳輝軍事文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

二、近人研究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編寫組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第 1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朱德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李建國，《中國工農紅軍的創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金冲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凌步機，《中央蘇區軍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張廷貴、袁偉，《中國工農紅軍史略》。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曾憲文、劉曉農編，《井岡山鬥爭軼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
黃惠運，〈毛澤東、袁文才大倉村會見〉，收入胡龍生、劉文源主編，《崢嶸的井岡歲月》。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9。
黃道炫，《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劉秉容，《中國工農紅軍全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黎連榮，〈「朱毛紅軍」的發展沿革及戰鬥歷程〉，《軍事歷史》2002 年第 4 期，北京，頁 62-67。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著，梅念譯，《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59 (June 2017), pp.171-215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7.59.04

How Can One Spark Set the Prairie Ablaze: The Rise of the Red Army Led by Zhu De and Mao Zedong

Ren, Wei*

Abstract

The Red Arm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ew from initially only having several thousand people led by Zhu De and Mao Zedong into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in just three or four years, the karma of which is worthy of discussion. When first coming to Jinggangshan area, Mao Zedong, Zhu De, Peng Dehuai, Wang Zuo, and so on, in fact, each created his own idea.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Red Army to grow in the Jinggangshan area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1929, the Red Army were forced to go fugitive to the south of Jiangxi and the west of Fujian, but unexpectedly the situation quickly opened up. But,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was not actually within Mao Zedong's plans, s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uld be said to have this blessing in disguise. After 1930,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Red Army, in addition to geographical factors,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radical polic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During Li Lisan's period of administration,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dvocated attacking the central cities; but Mao Zedong strongly opposed it. This "historical misunderstanding" unexpectedly prompted the Red Army troops to have great development. By the time of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campaigns against

* Ph.D.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Lecturer of The Party's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o. 100, Dayou Village,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91, P. R. China.
E-mail: renweirenjing@163.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the Red Army had shown the signs of boom—and—bust, but the war still continued, so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stop the momentum of the expanding Red Army. So then, what on earth was the conscription sca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Soviet Area and how did people react, which all may be worth discussing.

Keywords: the Red Army, expanding the Red Army, Mao Zedong, the Soviet Are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